中山大學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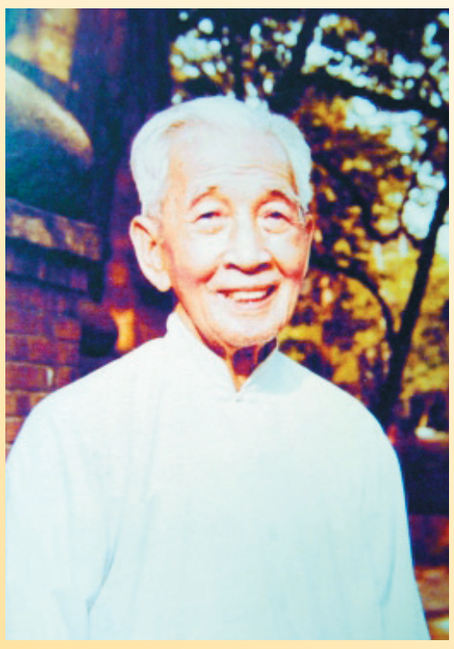
2014年12月26日

SUN YAT-SEN UNIVERSITY GAZETTE　一版责编、校对：卢旖维　二版责编、校对：徐津阳

论容庚精神

——为纪念容庚师一百二十周年诞辰而作

■ 中文系　陈炜湛





容庚先生书法作品

也许有读者一看题目，便要责难：弟子直书恩师名讳且论其精神，可乎？大不敬也。

也许有读者看到这题目，便要质疑：容庚有何“精神”可论？若每个学者都冠以某某精神，岂不“精神”满天飞？

也许有读者看了这题目，便要摇头：弟子论师多谀，不能公允，即使公允无谀，又有何意义？于世何益？

炜湛愿先行作答。一、古有临文不讳之例，直书恩师讳，只为行文方便且求一致，不得已耳，非敢有丝毫不敬也。相信恩师在天之灵亦必予恕宥。二、并非每个学者皆有值得后辈敬仰而阐述的“精神”，而容庚之有别于其前辈同侪，足令后辈敬仰有加者，固因其著述宏富，更缘于其独特之精神。举例而言，为一部著作前后倾注六十余年心血以期完善，而将历年积累之百余万言手稿归诸“只是玩玩而已，不能算数的”之列①，除容庚外，并世尚有何人？此即容庚精神！“容庚精神”之外，当然还可有其他学者之与众不同而有益于世的精神，诸种精神固可并存而共耀于世，然决无“满天飞”之虞也。三、弟子论师，必有谀词乎？非也。鲁迅论章太炎便是一证。在古文字学界，近者如姚孝遂之论于省吾，黄德宽等之论姚孝遂，张永山之论张政烺，裘锡圭之论胡厚宣，吾见其真情实感也，谀词则未之见也。且弟子之谀师，犹臣工之谀君，各有所图，当在生前，不在身后。今炜湛之敢论容庚精神，实缘近年目睹学界诸多怪象，深感若容庚在，必直斥其非，或笑而齿冷。当今学界（古文字学），亟需宏扬正气，激励后进，祛除浮躁，容庚精神实乃一剂良药。宏扬容庚精神，有利于学术，亦即有益于世。

炜湛之所谓容庚精神，乃指作为学者的容庚精神。其中有些是与其同时代的一些学者所共有的，如爱国、刻苦、真诚，而容庚又有其特殊性；有些则是唯独容庚具有而鲜见其匹者。终身治学坚忍不拔，诚信无城府，自信自持不自伐乃其核心。约而言之，当有七端，请依次述之。

一、真诚爱国，不论顺逆，虽“九死而无悔”

对于容庚的爱国热诚、刻苦治学，是举世公认，不容置疑的。曾宪通、张振林、陈初生等均有文述说。最难能可贵、令人肃然起敬者，在于容庚之爱国情怀，熔铸于学术，而且不论处境之顺逆。旧中国积贫积弱，饱受列强欺凌，珍贵文物若商周青铜器为人巧取豪夺，流失海外。容庚痛心疾首，发愤而著《海外吉金图录》，首录流落日本之重要器物以昭告世人。“九·一八”事变后，立即停止寄予旅居日本之郭沫若一切新发现的古文字古器物资料，以免落入敌手，并敦促郭氏早日归国。新中国成立后，政治运动不断，容庚亦屡直言贾“祸”，不免时处逆境，但爱国之情不变，依然潜心学术，为国家的文化教育事业努力工作，绝无消沉怠惰之日。一旦受命为国效力，即欣然而往，功成而归。文革期间备受冲击而不废著述。境外某大学闻其处境艰辛，曾派员登门敦请，并许以高位厚酬。容庚不为所动，当即谢绝，并表示境况虽差亦不可去国他往。可谓处逆境而不变初衷。容庚素来直言无忌，至老不渝。文革后期，炜湛尝闻夫子言曰：“共产党比国民党好，新中国比旧中国好，建国以来成就巨大，有目共睹，谁都知道。但十亿人口个个唱赞歌，没有人出来说话，也未必是好事。”所谓“说话”，当指批评进谏。爱国直言之容庚，实乃共和国之谏臣，共产党之诤友，不可多得者也。事实证明，容庚当年“说”的“话”，有不少是正确的。特别是那些惊世骇俗令人捏把汗的话，生前遭批判的话，现在看来却是很了不起的。如反右派时说中山大学中文系几位教授被划为右派是“冤枉的”，“他们不是右派”；文革之初说批海瑞罢官，批“三家村”等“有点像兴文字狱”；“评法批儒”期间说“批孔无必要”，“批许（慎）更无必要”。

二、刻苦治学，锲而不舍，无论顺逆，至老弥笃

容庚著述一生，著述宏富，世所公认。他少时即“有饭蔬衣練宵遐方绝域尽天下古文奇字之志”，毕生坚持，矢志不移。最令人钦敬者，早年（1922）挟《金文编》稿本谒罗振玉时，罗氏即予认可并促其印行，容庚却觉得所见未广，尚须增益删改，并不急于面世求名。他尽观罗氏所藏金文资料，潜心研究，精心编撰，三年后（1925）才影印行世。嗣后复从事秦汉金文之搜集研究，先后成《秦汉金文录》、《金文续编》，并继续搜集商周金文，于1939年出版《金文编》第二版；又越二十年，于1959年出版第三版；嗣后复继续修订、增补，文革之中，身处逆境仍孜孜于此，并毅然决定出版第四版，为此殚精竭虑，直至因病卧床不起（1982）。其晚年伏案增补修订情景，炜湛至今尚历历在目。汉有许慎作《说文解字》倾注毕生精力，后人言许慎但知其有《说文》而不论其他；清有段玉裁，作《说文解字注》，亦倾注毕生精力，后人言段氏但知其有《说文注》而不及其他；今有容庚作《金文编》，亦倾注毕生精力，若干年后，学人言容庚，大概也但知其有《金文编》而不论其他吧。一部《金文编》，集中体现了容庚治学精神。

三、鉴古知今，与时俱进，支持文字改革，身体力行，始终如一

研究古文字，关注今文字，这也是容庚有别于同时代古文字学家的精神之一。上世纪三十年代，基于对秦汉金文的研究，基于对汉字发展规律的认识，容庚明确指出“观于秦汉简字的流行，益坚吾改革字体之信矣”，并断言“推阐文字变迁之迹，逆睹简笔字终当大行于世”。他还自编《简体字典》，于燕京大学试用后正式出版，这是容庚对文字改革的切实支持。难能可贵者，此后数十年容庚著书立说，都尽量使用简体字（有些是自创的），《金文编》第三版便是最好的证明。容庚支持文字改革的精神也是至老不变的。新中国成立后，他出席过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也曾著文批驳攻击文字改革的言论。《汉语拼音方案》、《简化字总表》公布并实行后，有海外热心人士犹另起炉灶，另造新方案，来穗请容庚“审阅”，希予题辞支持，容庚婉拒之，未著一字。

四、尊敬前辈，感恩终生，无论顺逆

容庚从一名中学生一跃而为知名学者，大学教授，除本人努力外，实缘于母亲教育，舅父邓尔雅指导，前辈学者罗振玉提携。容庚尝著文自述如何受母教而成人，如何从舅攻印治学而立志，又如何得罗振玉激赏提携而成名，尊敬感激之情溢乎言表。对于邓、罗二人，可谓感恩终生，没齿不忘。1954年邓尔雅逝世后，容庚复尽力搜集其遗著，编为《绿绮园诗集》行世，容庚与相关亲戚信札往来，反复商讨，可谓殚精竭虑，读来令人感动。对于罗振玉，容庚更有一种特别深厚的感情。罗之于容，并无师生之名，却又有师生之实，其情谊亦逾乎一般师生。而且，容之尊罗，不仅在罗声名显赫之时，亦在其任职伪满、被人斥为汉奸之后；不仅在其生前，亦在其殁后。南归后于1946年所刊《甲骨学概况》依然列举罗氏对甲骨学的重要贡献。直至耄耋之年，依然念念不忘罗氏之恩，常言“没有罗振玉，就没有我今日之容庚”。

五、竭诚待人，不论长幼，但言信义，毫无城府

容庚一生待人以诚信，学界有定评。他与“未知友”郭沫若的文字之交，已广为人知，有曾宪通编注之《郭沫若书简——致容庚》一书在，毋庸赘言。编著《殷契卜辞》时，令瞿润缗参与考释，又请董作宾、唐兰、商承祚校阅，三家意见录入考释，分别标明“董作宾曰”、“唐兰曰”、“商承祚曰”，充分尊重友人见解。修订《金文编》，广引通人之说，即使是学生之说亦必标举其名，决不掠美而“没收”之。现翻开《金文编》，首页“元”下便引有“高景成说”，高景成乃当年容庚在燕京大学任教时的学生，事隔数十年，1986年12月在北京西山举行的汉字问题学术讨论会上，与炜湛谈及此事仍激动不已，说他的姓名也藉《金文编》而传诸久远了。

对于后辈、学生以及慕名求教者，容庚是有教无类，同样是竭诚相待，绝无城府。对于登门问字质疑者，求字者，借书者，容庚几乎是有问必答，有求必应，均给予充分的信任。《金文编》原稿本可以借给人拿去阅读研究，不怕人家不归还；正在修订中的《金文编》第三版批校本也可借予友人参考，且允许照相、引用，这在他人是难以想象的，但容庚却无任何顾忌。他对学界友人，无论长幼，均信而不疑。值得顺便一提的是，他竟然把准备再版用的《商周青铜器通论》亲笔批校本也让人要了去研读，结果文物出版社1983年再版该书时，不能据批校本予以修正。而容庚批校本的手持者，居然在该书再版后发表文章，将批校内容逐条列表刊出，且称此批校本为容庚生前所“赠”，呜呼！曹操是“宁我负天下人，天下人不可负我”，容庚则是“宁天下人负我，我不负天下人”。有此精神，便胸无城府，耿直无畏，诚以待人，虽被欺诳亦不改诚信之旨。

六、自信自持不自伐

凡治学有成者莫不自信，固不待言。然自信者未必能自持，尤其在声名日盛、奉承者日众之时，不免令人飘飘然，晕晕乎难以自持，乃至落入为人操纵、受人摆布之境而不自知。容庚则自信复自持。自信，对于自己的专长——青铜器及其铭文——及主要成就即《金文编》、《商周彝器通考》、《颂斋述林》等论著有坚定信心，相信足以传世。自信有能力修订《金文编》，改编《商周彝器通考》，毋须“靠集体力量”来完成。只缘客观条件欠缺、学术环境不佳加之文革动乱，未能实现《商周彝器通考》改编夙愿。《颂斋述林》本拟由中华书局出版，只是不愿按编辑部意见删改所谓“不合时宜”的内容，遂索回，搁置多年后印行于香港。自持，保持清醒头脑，不为赞誉所左右。八十岁后，除继续修订《金文编》，摘录相关资料写入书画小记外，不再撰写学术论文，尝戏言“要文章没有，要老命有一条”。究其故，他自认年老已难有建树，不如搁笔。以是之故，他也说一位多年老友的一些文章不做比做好。应人所求写字，也多抄录原铭，以“……子子孙永宝用”之类付之。究其故，惧写错字。他拒绝记者采访宣传，理由之一是他的成就都是早年在北京取得的，南归后特别是解放后“没有写过一个字”。他把晚年关于书画的一些手稿看作是“玩玩的”，“不能算数的”东西。②故遇到不得不填的一些“表”，在“科研成果”或“著作”一栏，他通常只有一行字，一句话：“《金文编》、《商周彝器通考》等。”他也从不向弟子后学谈他的成就，也从不要求弟子后学读他的著作，只是指示多读罗振玉、王国维以及郭沫若等人的著作。同许多老专家一样，容庚晚年，记忆力也有所减退，显得健忘，见到多年老友，竟不知其姓名，而问“贵姓”，数日后重见，又问“贵姓”，似乎有些糊涂；但在学问方面，在自我评价方面，一直清醒得很，一直把握住正业与业余的关系，创新建树与一般“玩玩”的区别，在这些方面，他绝不含糊，决不糊涂。这是极其难能可贵的精神。因此我想，假定容庚生前得到资助，要他自编学术著作集出版，可能会出现两种情况：一是拒绝，认为无此必要；二是只编著作集，不编“全集”。炜湛揣测，若是容庚应允自编，恐怕不会有现在大家看到的这套“著作全集”的煌煌二十二册规模，大概会舍弃其中一部分“玩玩的”、“不能算数的”以及自己不满意或并未写完的“著作”。容庚决非贪多求全的学者，他深悟“舍得”之理。

七、为文风雅清正，信而直

容庚为文，著书立说，一如其为人，真可谓文如其人。观《金文编》、《商周彝器通考》、《颂斋述林》三书，即可证炜湛言之不诬。容庚诸书自序，尤见其情性。他言己不讳过，成名后尝自叙少年曾染诸恶习，经母教而戒绝，从而立志治学。他论人衡文，无论古今，秉笔直书，不虚誉不掩恶，只论是非，不计利害。“其誉人也不望其报，恶人也不顾其怨”，一以学术为标准，《宋代吉金书籍述评》、《清代吉金书籍述评》、《甲骨学概况》诸文是这方面的代表作。讲真话、讲实话，从政治到学术，从为人到为文，一以贯之坚持终生，这便是容庚，这便是容庚精神！

综观吾师一生（1894—1983），生于积贫积弱、风雨飘摇的晚清，历经清末、民国与新中国三个时代。他的家乡东莞是岭南名邑，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他虽年幼而孤，但赖母教而成人，藉舅诲而立志。冠年北上，刻苦治学二十余载，饮誉京华。壮岁南归，依然孜孜不倦于学术文化之业，至老弥笃。他毕生治学，在世间留下煌煌巨著，更为后人留下了可贵精神财富——独立特行之容庚精神。

容庚精神，说到底，是对中国知识分子优良传统的继承与发扬，是我国传统知识分子美德的突出体现。继承和弘扬容庚精神，对当今学术界而言，很有必要。对于立志治学，初入学术殿堂者，容庚精神具有极大的激励、鞭策作用；对于那些小有成就即踌躇满志不思进取者乃至玩物丧志者，容庚精神无异一种振奋剂，足以促之上进，在学术道路上继续前行努力，取得新的成就；而对于那些有着“等身著作”而不能自持，在赞誉面前忘乎所以的学者而言，容庚精神也不失为一副清醒剂。至于近年来屡禁不止的各种学术腐败现象，学术不端行为，更与容庚精神格格不入，容庚精神则是其天敌与克星。

容庚著作常在，容庚精神永存！

二〇一三年十一月写于常熟

注：①②说详拙文《忆容庚师》，原载《东莞文史》第29期《东莞近百年文化名人专辑》，1998年12月；收入《陈炜湛语言文字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10月第1版。

伉俪迁葬康乐园　精魂一世永温存

——记陈序经夫妇迁葬于康乐园教会山岭南大学公墓

■本报记者　黄彦宁　高舒云



1929年—1931年陈序经夫妇在德国留学



故居内景



陈序经故居（杨鹏桦摄）



出席人员在陈序经伉俪迁葬仪式结束后合影（黄彦宁摄）

移葬岭南昭功德

11月30日上午九时，原岭南大学校长陈序经先生及夫人黄素芬女士的迁葬礼于康乐园教会山岭南大学公墓举行。公墓位于中大西区一隅，坐落在松柏红墙之间，显得格外静谧。这里长眠着原岭南大学理、工、农、医等学院院长及多位著名教授，昔日的荣光依旧照耀着一草一木，古朴的墓碑仿佛在诉说着先人们千古流芳的动人事迹。到场的嘉宾多数是白发鬓鬓的老者，身着素装，手持白玫瑰，环绕伫立于陈序经先生与黄素芬女士墓碑前。在历史系主任吴义雄的主持下，迁葬礼依序进行。全体默哀后，校领导、校友、教授及家属分别致辞。现场没有音响设施，话语似涓涓流水倾吐而出，致辞语质朴真挚、令人动容。致辞结束后，陈序经夫妇的骨灰奉安归葬，墓盖缓缓合上，伉俪从此静静长眠于斯，唯墓盖上方的鲜花迎风绽放。全体肃立，行三鞠躬礼，并依次将白玫瑰安放于墓碑前，徐徐告别。

深切追悼泪满襟

在迁葬礼的致辞仪式上，各位领导、嘉宾与到场人员一起缅怀先人功绩风骨。校党委副书记、副校长陈春生教授回忆起陈序经夫妇的生平与贡献，指出先生一生在多所大学任教，在文化学、政治学、东南亚研究、中国少数民族史研究等领域颇有建树，留下多达250万字的学术著作，先生值得我们敬重的还有他独立之思想和爱国之情怀。“陈序经先生一生爱国，献身学术和教育事业，勤奋耕耘，成果丰硕。黄素芬女士与陈先生相伴一生，风风雨雨中相濡以沫，令人敬佩。”岭南学院董事会名誉主席伍沾德的悼念信中提到：“陈序经校长带领岭南大学渡过了抗战后的艰难困境，从内地聘请大批顶尖教授学者，使岭南迅速发展到顶峰，成为当时国内最好的大学之一。”陈序经先生女儿陈云仙女士追思起先父先母的谆谆教诲，在学识上要“好学、勤奋、广博、慎思”，在做人方面要“善良、珍惜、宽容、感恩”。

重建宇堂流余芳

在通往图书馆的幽静小径旁有一栋红墙绿瓦的小洋楼——东北区319号，是陈序经先生在中大的故居，也是凝聚着丰厚的历史文化和学术记忆的康乐红楼之一。在2004年中大80周年校庆之际，学校开始在红楼前树立纪念碑，2012年中大88周年校庆之际，经修缮后的陈序经故居对外开放。

校图书馆馆长程焕文教授在开放仪式上说，“陈序经先生故居的书房部分，只有几个平方，空间十分狭小，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斗室和陋室。”而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陈先生完成了他大部分的传世著述，包括《南洋与中国》、《越南问题》、《东南亚古史研究》、《匈奴史研究》等。“荣声惟有死中得，真乐常从苦中来”，为陈序经先生所撰写，正是先生的真实写照。先生一生艰苦为学，以学为乐，勇于追求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中大师生的精神先导。如今与夫人共同归葬康乐园，愿先生风骨永流传。

出席迁葬礼的还有岭南大学广州校友会主席、中山大学原副校长李宝健教授，岭南（大学）学院董事会董事卢长玲女士，原广东省政协副主席、岭南大学广州校友会主席张展霞教授，中山大学原副校长胡守为教授，陈序经夫妇家属和图书馆工作人员等。此次仪式由校图书馆馆长程焕文教授组织策划，并由历史系主任吴义雄教授主礼。

陈序经夫妇生平

陈序经，字怀民，社会学家，历史学家，教育家，1903年9月1日生于广东省文昌县，幼居新加坡，1919年回国，先后毕业于岭南大学附中和复旦大学。1925年入美国伊利诺伊大学读社会学和政治学。1928年获博士学位，同年受聘于岭南大学社会学系，随即赴德国访学。1931年回国，先后在岭南大学、南开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执教，并任西南联合大学法商学院院长。1948年8月任岭南大学校长，1952年以后，历任中山大学历史系一级教授、中山大学副校长、暨南大学校长、南开大学副校长等职。1967年2月12日仙逝于天津。

陈夫人黄素芬，广东中山县人，生于1906年8月16日，与先生结缡于1929年8月，育有儿女曼仙、穗仙、其津、云仙、渝仙五人，1973年8月17日逝世。

（摘自陈序经夫妇墓志）

（上接第三版）是当时中华医学会历史上最年轻的副主任委员之一。

往事之二

经广东省科技厅批准，傅老师于1996年在孙逸仙纪念医院发起成立广东省糖尿病防治研究中心，并亲自担任主任。2005年5月，科技厅和大学相关部门负责人和我一起在永生楼外宾接待室见到了傅老师，也是因为年龄原因，傅老师不再担任广东省糖尿病防治研究中心主任。傅老师希望糖尿病防治中心在各方支持下工作能做得更好，为我省糖尿病防治事业做更多的工作。句句真心实意，字字语重心长。在他的推荐下，大学同意我担任广东省糖尿病防治研究中心主任，并报送科技厅备案。9年来，我心中一直牢记着傅老师的嘱托，以广东省糖尿病防治研究中心的名义开展了多项大型研究；也以此为依托，创建了“泛珠三角糖尿病防治协作论坛”，迄今该论坛已成功举办了七届；举办了三届中山糖尿病论坛。记得在南国桃园，第二届泛珠三角糖尿病防治论坛上我向大家宣布：傅老师是论坛永远的主席。

认识傅老师25年多，印象中，我没有在任何场合见过傅老师生气，更不用说发脾气。作为学者，他做学问，教书育人；作为医者，他精医术，治病救人。我们缅怀傅老师的不止是这些。作为个人，心中永远缅怀的还有我记得的这些小事。因为是这些小事感动了我，多年来也激励着我，做多些对自己科室、对本专业学科、对大学、对整个学界有利的力所能及的事情。

心中永远怀念傅老师。您是永远的精神导师，学习榜样！

（注：作者为长江学者；附属第三医院内分泌与代谢病学科带头人；现任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学分会主任委员，中华糖尿病杂志总编辑）